

新全球化语境中的苏南发展研究丛书

主 编 任 平

重 塑 碧水蓝天

苏南地区城市化与环境问题研究

宋言奇 · 著

苏州大学出版社

新全球化语境中的苏南发展研究丛书

重塑碧水蓝天：

苏南地区城市化与环境问题研究

宋言奇 · 著

苏州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重塑碧水蓝天:苏南地区城市化与环境问题研究/宋言奇著. —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6.9
(新全球化语境中的苏南发展研究丛书/任平主编)
ISBN 7-81090-696-8

I. 重… II. 宋… III. ①城市化-研究-苏南地区
②城市环境-研究-苏南地区 IV. ①F299.275.32
②X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50378 号

重塑碧水蓝天:苏南地区城市化与环境问题研究

宋言奇 著

责任编辑 张 凝

苏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苏州市干将东路 200 号 邮编:215021)

丹阳市教育印刷厂印装

(地址:丹阳市西门外 邮编:212300)

开本 850mm×1168mm 1/32 印张 7.375 字数 184 千

2006 年 9 月第 1 版 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1090-696-8/F·49 定价:15.00 元

苏州大学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本社负责调换
苏州大学出版社营销部 电话:0512-67258835

编 委 会

主 编 任 平

副 主 编 夏永祥 王卫平 钱振明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俊华 田 芬 许庆豫 严金泉

宋言奇 段进军 高 峰 蒋珠燕

薛华强

中国经验的先导 科学发展的探索

——在新全球化语境中苏南科学发展经验的最新研究

任 平

在一个高度全球化时代,关注中国经验、重视“北京共识”的人决不可能忽略苏南。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苏南是一块充满活力和屡创神奇的福地。严格意义上的苏南,包括苏州、无锡、常州及所辖县市,东接上海,西望南京,北临长江,南抱太湖,毗邻浙江,是长江三角洲的主要腹地,自古为富饶秀丽的鱼米之乡、人文荟萃的人间“天堂”,明清以来更是物产丰饶、工商繁荣、人文荟萃、风景秀丽之地,高度发达的农耕文明为苏南的社会变迁提供了强力支撑。在从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中,苏南曾经率先发起多次冲击,一直成为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先导区域,具有耀眼的先锋气质和夺目光芒;苏南经验成为中国经验的前导要素,对中国发展起着引领作用。正因为如此,聚焦苏南社会变迁的发展研究也一直成为“中国区域发展”理论体系中的一门显学。

马克思说过:“任何意识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随着历史语境的每一次重大变迁,对苏南发展的研究视域总是发生重大转换。那么,站在 21 世纪初的高起点上,与以往相比,在当代,对苏南的研究语境和研究视域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根本性变化?

我认为,主要是发生了两大转换:从旧全球化时代向新全球化

时代的转换；从经典现代性向新现代性的转换。理解这两个大转换，是我们科学辨识当代苏南发展特点的历史条件，也因而构成当代苏南研究新视域的历史语境。在这一时空交错的转换界面上，苏南研究发生了视域、问题、思路的新转换，获得了新成果。本丛书，正是这一新成果的主要形态。

正如我一再指出的那样，在世纪之交，世界范围内一个具有重大而深远意义的事实是：随着科技革命与知识经济的来临，旧全球化时代正在被新全球化时代所取代。新旧全球化时代大转换凸现了五大转变：

在产业经济基础上，从工业文明向后工业文明或知识文明转换；

在全球结构上，从“工业文明—农业文明”两极结构向“后工业文明—工业文明”结构转换；

在全球内在张力上，从片面的“一体化”向“一体化与多元化”双向互动转换；

在全球控制方式上，从商品、资本输出和武力等实体控制向信息、科技、文化、人才、知识等软控制方式转变；

在全球主义思维方式上，从主张单一“西方中心论”的旧全球主义向具有后现代主义的多元、差异化旨趣的新全球主义转变。

历史表明：新旧全球化时代的差异及其转换，是造就苏南发展各个阶段差异的根本历史原因，也因此是造就苏南发展研究三大阶段的历史语境。三个阶段的差异，是新旧全球化这一历史语境的大转换在研究意识层面上的表现而已。第一阶段，发生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旧全球化时代，当工业化、城镇化作为中国现代性的主要标识，以费孝通先生《江村调查》和陈翰笙先生的无锡农村调查为代表，以乡村工业化和城镇化问题为主轴，当时的苏南研究主要着眼于中国初次现代化进程中的苏南农村产业结构和城乡关系结构的变动；第二阶段，在 20 世纪 80 年代，在新旧全球化时代大

转换之际,当“差异性”和“多元性”发展模式开始崭露头角,中国拉开了改革开放和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大幕,苏南研究着力考察在计划体制外生长的不同方式和发展道路过程中,以“内生型”和“外向型”等不同市场化路径实现工业化模式的比较为主轴,费孝通提出的“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广东珠三角模式”的比较,以全球经验为知识背景,着眼于在国内、在体制外生长模式之间差异性的比较研究。第三阶段,21世纪初,当西方在“知识文明或后工业文明”驱使下将制造业大量扩散到发展中国家,形成了新全球化时代特有的“知识文明—工业文明”新全球二元结构时,当苏南已经成为中国开放型经济的先导、国际制造业集聚的主要地区时,研究需要着力反映苏南如何在深度融入新全球化时代、成为新型工业化和新现代化先导区进程中面临的问题与挑战,经验与成就。

21世纪初苏南研究的另一个重大语境的变化是中国发展从经典现代性走向了新现代性,走向了科学发展阶段,它同样是在新全球化时代发生的。旧全球化时代催生的经典现代性,是以14~15世纪启蒙现代性的两大要素:大写的人与大写的理性为根基的。大写的人是巨人,那时是一个需要巨人、也造就巨人的时代。大写的人反对大写的上帝,将神人颠倒的关系再颠倒过来,使人成为主体;大写的理性反对信仰蒙昧,使人成为自主思想的主体。自主性、自觉性和自为性成为主体的主要特征。但是,理性人在追求无限膨胀的物欲中既迅速扩大了工具系统,带来了工业化的后果,又造就不断扩张的资本。资本与工具理性一起,在全球的扩张造就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的“世界历史性交往”及其“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以产业的工业化、经济的市场化、空间的城市化、政治的民主化和文化的世俗化,加上历史观上的单线论,人对自然的驾驭、控制和奴役,以工业和资本为基础的旧全球化,就构成了经典现代性的基本特征。经典现代性造就了

客体依附主体、农村依附城市、农业依附工业、东方依附西方、自然依附人。马克思·韦伯主张的目的理性,演变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假设”和工具理性,成为一个时代的标识。经典现代性在造就辉煌的同时也造就重大历史偏颇,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在现代性的根基上,表现为单一主体性、绝对理性和工具理性;在现代性的社会存在维度上,主要表现为工农对立、城乡对立、劳资对立、人与自然对立、东西对立,以及技术主义领先的工业化、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工具理性化的科层制或代议制民主,等等;在现代性的思想维度上,强调单一中心主义,现代化就等于西方化;在现代性的文化维度上,将追求物质财富和利益的最大化(所谓“物的现代化”)作为主要标准,将西方文明奉为惟一的文明,而其他民族文化被视为“异质”的野蛮,因此,“文明与野蛮”,就成为旧全球主义的文化视域;在现代性的历史维度上,传统向现代的转变就成为一种排斥多元发展可能的线性思维。这一经典现代性在当代中国的发展观表现,就是以 GDP 为中心的发展客体论。它主要有两大特征:其一将发展的本质和目标锁定为人之外的财富、物、GDP,人作为发展主体的本性被异化为对象客体的物之中,因此才有发展的 GDP 崇拜;其二,是以研究经济增长为中心的经济发展理论成为发展理论的基本范式。当然,在这一狭义的发展观中,除了经济、GDP、财富,其他发展要素都相对地被边缘化。正是在这一阶段,“苏南模式”一枝独秀,成为享誉全国的榜样。以乡镇企业为基础、以城乡一体为依托,建构了发展的共同体主义,相对协调了城乡、工农之间的差别,兼顾了经济发展与精神文明,产生了“两个文明一起抓”的张家港精神。但是很难成为全国普及的发展观。各区域间发展观和发展模式的比较标准,仍然偏向经济、财富和 GDP。政府主导、效益下滑和统筹过度等弊端,终于使“苏南模式”在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后逐渐消散,乡镇企业的改制釜底抽薪,“苏南模式”因失去了最终的经济支撑而不得不让位于外向型

经济。新全球化时代的国际产业布局建立在“苏南模式”的历史基础上,得以迅速发展。从乡镇企业到外向型经济,转换的工业化模式在苏南的发展迅猛无比。当我们不得不面对新全球化进入本土的大潮时,新现代性与科学发展观已经悄然而至,成为统领新发展阶段的纲领。超越经典现代性和传统发展观的缺陷,以新现代性为基础的科学科学发展观融会了全球各种新的发展观:从英格尔斯的以“人的现代化”为核心的发展主体论到多斯桑多斯、弗兰克等人的“自主的”、“反依附”的全球发展理论,从罗马俱乐部对“人类困境”的忧思到布朗“可持续发展”观念,从哈维的城乡协调论到罗默的创新的知識经济理论,以及阿马蒂亚·森的“自由发展观”等等。科学发展观更是针对当代中国发展重大问题的科学思考与解答:如何解决“为谁发展、靠谁发展”这一根本问题;如何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这一世界级难题;如何统筹发展城乡、经济与社会、区域、代际之间和代内之间的关系,如何建立人与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建立一个有机发展社会,等等。正是在这一视域下,苏南研究被推上了一个更新、更高的平台。

本丛书就是以创新的两大理论——新全球化时代和新现代性理论及科学发展观为研究视域,以推进“两个率先”、构建和谐社会的实际为主线,进一步深化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理论的研究,科学总结苏南的实践经验和特色;研究分析 2005 年以苏州为代表的苏南率先实现全面小康社会主要指标后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明确下一步发展重点、方向和工作举措;对 2020 年苏南实现现代化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的状况进行预测分析,为未来发展目标、发展战略的正确制定提供科学依据的研究成果汇集。本丛书的选题都是围绕在新全球化与科学发展观这一新平台上苏南如何站在更高的起点上实现更新的发展和更高的跨越而设计的。以科学发展观重新反思苏南发展史,力促发展思路的重新转换,对基

本实现现代化的问题和目标、策略与路径的重新探索,对苏南实现科学发展所必然需要关注的重点、必然需要突破的难点加以重点研究,如教育公平问题、新农村建设(特别是农民卫生健康保障等公共物品的供给)问题、土地节约利用问题、高速城市化进程中的环境保护问题、自主创新的宏观机制问题,等等,这一切构成了本丛书的基本内容。

二

《苏州之路》是政界与学界携手合作反思和研究苏州发展道路的一部力作。

苏州作为苏南发展的先行军,中国全面小康社会建设与现代化的先导与示范区域,其率先发展的经验总是十分重要的,也非常诱人。对许多外界人士来说,苏州是个谜。外界人士对率先发展的苏州地位褒贬不一,对苏州创造的率先发展经验又存在着许多争论,使这一谜团更浓,使人如入云雾山中。其实,问题出在研究境界不够高、研究视域不够正确。“不畏乌云能蔽日,只缘身在最高层。”只要站得高,看得远,“望断天涯路”,就不会陷入迷惘。地方经验的普适意义不被认同当然就毫无价值。但是,我认为对苏州经验的高度认同和广泛共识只能来自于对其意义的科学认识和深刻理解。

进入新世纪以来,苏州一直以科学发展的先导和示范引领全国,成为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先锋,这是有深刻根据的。

2005年,苏州所辖5县有4个进入全国百强县前十名,昆山成为百强之首。2005年底,“天堂”苏州不辱使命,顺利完成“第一个率先”的重大任务,不愧为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率先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首批实验室”。到2005年末,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4 026.52亿元,全部工业总产值接近

12 100亿元,进出口总额1 406 亿美元,农民人均纯收入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分别超过8 300元和16 276元。2006年2月11日,经省委李源潮书记率领的考核组考核,“天堂”苏州不负众望,达到省定全面小康社会标准,正逐步转入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新的伟大征程。

在“第一个率先”完成的4大类18项25条指标体系中,苏州创造的一份经验清单足以向全世界证明:以科学发展观与构建和谐社会为指导方针的苏州发展实践正在创造新的“中国经验”,标志着谋求科学、和谐发展的中国时代已经来临。系统而科学地总结苏州的成功经验,意义重要而深远。我们认为,苏州“第一个率先”正在探索“苏州版”的科学和谐发展模式,突显了“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有机融会了“五大统筹”和“六大和谐”的要素,形成了自己的鲜明特色,创造了新经验,谱写了新篇章。

《苏州之路》的反思表明:“现代性是流动的”——《流动的现代性》一书作者鲍曼如是说。岁月流逝,苏州在走向现代性的历程中,一直在嬗变,没有抱残守缺、僵化模式,有的是与时俱进、脱胎换骨的创新。曾记得,20年前,“苏南模式”一度誉满中华。约10年前,有人说“苏南模式”终结了,消亡了。这不过是又一个现代版的“凤凰涅槃”。苏州的“火凤凰”用一把火烧掉的仅仅是自己身上过时的旧羽毛,而变化出来的却是更具生命力的新形态。“苏南模式”非但没有终结,而且在新形势下发展了,创新了,并演变成了当前越来越受到人们关注的“苏州现象”、“苏州经验”,进而在科学发展、和谐发展中开拓“苏州之路”。任何模式都不过是苏州之路上的一个外在的路标。我们不可能将苏州之路上形成的任何阶段形态即某种苏州模式——无论是以乡镇企业为基础、以城乡一体为依托、以政府(政权)推动为抓手的“乡村发展共同体主义”或者是以县域经济为依托、以开放型经济为基础、以地方政府推动为抓手的新苏州模式——凝固化,甚至僵化。苏州之路是

创新之路。创新的成果只有在不断继续创新中才能保持生命力。如果说,今天的人们可以对“苏州之路”作多重解读,可以赞叹和津津乐道,那么,这一反思正是苏州将再一次经历“凤凰涅槃”燃烧自己的羽毛而创新形态的途径。苏州人虽然善于总结经验,但很少去欣赏,而总是把经验更多地留给别人、留给后人。这是因为苏州人从不知道满足,创新的特质从未停止。这也许是苏州人的最大优点,也是其与时俱进、不断发展、敢于率先的内在动力。

三

率先发展的苏州乃至整个苏南必然比全国其他区域率先“遇坎”,遭遇困难和挑战。这一方面是因为“率先发展”使然,率先发展就像战场上听到冲锋号响第一个站起来冲锋的勇士,或者在敌方地雷阵第一个以自己身躯滚开道路的英雄,遭遇敌人子弹的机会、牺牲的机会总是比后面的战友多些。“第一”、“率先”伴随着高风险性、高成本性,每一个经验都来之不易。而第一个遭遇困难的苏南,总是在率先克服困难中找到发展的新机遇、新增长点,找到发展的先机和答案,因而率先创造经验、形成模式,走出自己的路。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苏南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模式使然。借助于开放型经济,苏州等城市创造了发展的新奇迹,站在了全国的新制高点上。但是,这一模式虽然创造了第二波奇迹,但是在向科学发展、自主发展的第三波模式转换中,不可避免地也遭遇诸多挑战:外向型经济与自主创新的冲突;制造业偏重与经济结构调整的冲突;GDP 偏高与富民政策的冲突;工业发展与环境资源压力的冲突;经济效率的提升与社会公共物品供给相对不足的冲突,等等。如何科学分析苏南发展存在的问题,如何有效化解发展难题,推动苏南迅速有序地转入科学自主发展的新轨道,就成为本丛书研究的重点。

《长三角与苏南：走向可持续发展研究》旨在阐明这样一个主题：以上海为发展龙头的长三角，是支撑苏南几个阶段发展的主要区域资源。没有上海老工业基地扩散的支持，就没有苏南乡镇企业这一早期工业化阶段的历史；没有在新全球化时代浦东开放、开发的大环境，就没有苏南的开放型经济和国际制造业的地区集聚。苏州市委曾经用“大树与碧螺春”的关系来形容上海与苏州的关系，这确实很形象也很贴切。那么，在科学发展阶段，如何联手环太湖流域的城市，如何进一步加强合作，使之在长三角区域“雁阵般起飞”中紧跟领头雁，飞得更快、更好，这一系列问题需要深入研究。该著作就是对这一系列新问题加以深思的产物。

《苏南地区自主创新与国际竞争力研究》一书主题十分鲜明：在中国选择“创新型国家”发展道路过程中，一个具有对国际知识产权高度依赖的苏南地区，如何尽快自立、自强、自主地发展地区的品牌经济，尽快完成从“苏南制造”到“苏南创造”的转变，这无疑完成从第二波模式向第三波模式转变的关键。如果我们失去这一重大历史转型机会，那么，尽管我们曾经是第二波经验的英雄，也极有可能成为第三波模式的落伍者。从苏南地区知识创新条件来看，没法与世界知识生产密集的一流区域如美国的旧金山湾比，也不敢望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之项背，甚至不如南京、重庆等高校密集、科研院所林立、高端人才济济的大城市，那么如何寻找自己的独特优势、走自己自主创新发展的独特之路呢？该著作从如何加大公共政策创新，率先构建高水平科技创新平台、公共服务平台角度着眼，做了深刻的、具有独特视野的探索，相信关注的读者一定收益良多。

《苏南小康社会与教育创新》着眼于教育的“苏州风暴”：在一个经济发展迅猛的社会，如何让教育成果惠及所有学子，实现教育公平的理想。因为，市场经济造成了利益分化，推动中国从一个计划体制下的“同质性社会”转变为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差异性社

会”，差异的利益主体之间在各种经济和社会的许多资源占有上的差别越来越大。一定的差别当然可以催生社会活力，激发社会成员的进取心，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无疑是合理的。但是，社会成员在享受国家给予的资源中不当有差别，这是任何国家发展的一个底线，这涉及正义和人权问题。长期以来，由于城乡二元分裂的社会结构造成了在教育、卫生、就业、社会保障等各个环节上占有公共资源的不公平、不平等，直接成为阻碍中国进一步科学发展的障碍。教育还是人口质量再生产的主要环节，是人们进入现代职业体系的直接基础。在这一起跑线上输了的孩子们，很难再后天赶上去。“教育是否公平”不仅涉及当代人的“代内平等”，而且牵扯出“代际公平”的大问题。

《先导与示范：21 世纪初苏南农村卫生服务体系研究》再次牵扯出一个沉重话题：在传统农村合作医疗模式衰亡后，如何有效地保障农民的健康利益不受损害，不因病致贫、返贫？从价值创造角度来看，中国也许已经说不上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部门创造的价值在整个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越来越少。但是，从人口来看，中国依然是一个农民大国。农村人口仍然超过总数 13 亿的一半还多。农民依然是中国现代化的主体人口。这就是一个大矛盾：占总人口一半多的人口创造的价值却不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1/4，人均产值和人均收入肯定远低于城市人口。2005 年，全国农民纯收入与城市人口可支配收入比已经达到 1 : 3.3。较低支付能力、庞大的人口基数，对高度市场化的卫生服务体系来说缺乏吸引力。就全国来说，在实行新型合作医疗制度之前，农村的卫生服务体系几陷于瘫痪，农民的健康几乎没有保障，多年绝迹的传染病卷土重来，出现了因集体卖血而感染严重的“艾滋病村庄”，地方病又层出不穷，因病致贫、返贫现象严重拖了中国发展的后腿。毫无疑问，没有中国农民的健康，就没有中国的全面小康。公共投入应当矫正市场失灵。那么，在市场起基础性资源配置作用的中国，解

决农村卫生保障体系,政府何为?在率先发展、勇于创新的苏南,这一问题是如何解决的?该著作从农村社区卫生体系的规划、建立、发展和作用等一系列角度入手,深入总结苏南经验,为全国新型合作医疗体制的开展,提交了一个可资借鉴的范式。

《重塑碧水蓝天:苏南地区城市化与环境问题研究》又涉及到苏南另一个沉重话题:环境与资源。的确,国际制造业在地区内的高度集聚,必然造成环境的相对恶化和地区资源的集中消耗。“相对恶化”是指尽管跨国公司和全球公司的排污水平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但是工业区域内企业大量集聚,污染总量肯定会对地区环境造成越来越大的损害。苏南开放型经济在实现从初期的“招商引资”到后期的“招商选资”转变,环保指数肯定是一个必备条件。“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从昆山经验普及到全国。但是,“绿水青山”也未必就没有污染。目力所及的“绿水青山”相伴随的高技术产业污染甚至比传统产业污染更有害,超标准的电磁辐射、高频辐射可以伤人于无形,更需要我们认真对待。资源消耗也是如此。尽管这些公司的资源消耗水平优于国产企业,但是集聚化就必然会造成地区性资源短缺。“蓝天碧水、绿水青山、环境幽雅、生态良好”的城市并不一定就是可持续的。可持续性需要计算城市人均消耗的各种物理和生态资源,及本地区对这些资源的承载能力和供给能力。加拿大学者瑞斯所提出的“生态足迹”是伴随人均资源消耗量来测算的。如果一个地区资源不能有效满足自己的消耗,那么就必然会出现生态“赤字”。地区资源占消耗量比值越低,就越说明生态“赤字”的严重。如何在走向科学发展道路上,进一步加大环境保护力度,就成为该书作者与读者交谈的主要内容了。

《苏州城镇化进程中的土地节约利用与可持续发展研究》凸显了苏南在高速城市化与工业化进程中所必然遭遇的一个大难题和大“瓶颈”:土地短缺。前工业化阶段,苏南人口就高度密集,人

均不足1亩地,迫使大量剩余劳动力通过举办乡镇工业来实现转移,但是工业化相伴城市化的高速发展必然使原本就十分紧缺的土地资源更加紧缺,耕地不仅在某些高速工业化的郊区大量消失,甚至在并不紧邻大中城市的农村也几近消失。土地“瓶颈”越来越成为制约苏南经济发展的因素,迫使苏南人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推动“制造业为主模式”向“研发—销售为主模式”转变,千方百计节约利用土地,统筹城乡结构,实施科学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四

在新全球化和新现代性视域中反思苏南经验不仅需要经验表述,而且需要理论创新。解释学告诉我们:任何反思都存在着对象与方法的双向循环。独特的对象当然需要选择独特的方法,但是,独特的方法也选择甚至打开独特的对象。对象深层的本质,没有同样深层的理论来穿透,是难以把握的。

任何理论都是问答逻辑。时代提出问题,理论解答题,理论是时代问题的解答。苏南经验研究,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我们的理论创新。新全球化时代理论、新现代性理论、中国特色可持续发展与环境支持理论、跨越发展理论、中国辐射型现代化阶段理论,等等,都在本丛书研究中被逐一展开,这也许并不成熟,但是,创新需要“第一个”提出。“宁稚嫩而创新,勿老成而平庸”,是本丛书作者们抱定的宗旨。正因为如此,我衷心希望来自读者们的批评和鞭策,这将是我们的理论得以不断完善的精神动力。

2006年3月28日

(作者系苏州大学中国农村城镇化研究中心主任
苏南发展研究院院长)

前 言

21 世纪是中国城市化的世纪。在 21 世纪,中国将由 2001 年 37% 的城市化起点,到最终实现城市化,进入城市时代。这是一项浩大工程,也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大壮举。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斯蒂格里茨对此作了高度评价,他认为,中国的城市化与美国的高科技是 21 世纪人类的两件主要大事。

城市化是有阶段性的,当城市化水平达到 30% 以后,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城市化进程就进入加速发展时期。我国目前的城市化已经进入加速发展时期,并且以每年 1 个百分点的速度高歌猛进,这是令人振奋的。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伴随着城市化的加速发展,我国的环境状况已经不容乐观。目前,在全球污染最为严重的 10 个城市中,我国就占据了 7 个,在全球最不适合人居的 20 个城市中,我国就占据了 12 个,我国的环境状况已经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

从国际范围看,城市化的进程与环境问题是密切相关的。一些发达国家,如英国、美国以及日本等国在城市化起步阶段以及加速发展阶段,环境问题都十分突出。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基本完成,这些国家的环境状况日趋好转。这些国家在城市化进程中,都选择了“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径。我国的城市化进程是否也要步西方国家的后尘呢?答案显而易见,不能。这是因为:其一,西方国家在城市化加速发展时期,全球环境容量还很宽裕,西方国家还可以大量向发展中国家转嫁环境成本。而目前全球环境容量已经